

王 炎

奥斯威辛之后

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

高速运转的电影工业正给我们生产着记忆，它的产品可以按照集成块的方式任意组合我们的过去，

记忆的时间性被抽离了。我们有的只是影像化的、超现实的、不可置疑的空间化的过去。人们不必

再费神追忆似水年华，也不必再争论历史的真实与再现的可能，更不必思考自己的身份与家族和民

族史的关联，超大的银幕“供应”给我们所需的一切，它告诉你是谁，应该如何思考，该如何回忆。





银幕不是一扇透明的窗户，但光影会让我们产生“窥视”历史的幻觉。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化消费的中心话题，大量的历史影片以冲击力很强的史诗性叙事塑造着观众的历史意识。特别是“二战”屠犹题材，这个当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话语，已成为美国学院体系中发展成熟的庞大学科，而影像再现“大屠杀”更隐含着复杂的价值判断。本书以跨学科的视角分析“历史见证”影片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

ISBN 978-7-108-02605-7



9 787108 026057 >

定价：18.00元

奥斯威辛之后

——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

王 炎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斯威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 / 王炎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

ISBN 978-7-108-02605-7

I·奥… II·王… III.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史料-研究 IV.① K152②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1953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目录

序：幽灵之镜	戴锦华	9
引言：一个古老民族的影像寓言		13

上编：影像生产与屠犹记忆

《出埃及记》：现代的“摩西”神话	23
出埃及记	23
大屠杀后的犹太复国	27
口述复原的“浩劫”	31
何处才是许诺的家园	36
《浩劫》：口述再现的“屠犹”记忆	43
当口述超越了画面	43
让历史“在场”	46
宽恕在集中营死亡	49
逝者已逝，追者安追	51
《纽伦堡审判》：一个犹太军官眼中的世纪审判	61
纽伦堡的旁观者	61
法律背后的政治角逐	64
仪式化的司法公正	68
以国际法的名义	72

《慕尼黑》：“犹”疑的“反恐”行动 79

败走奥斯卡 79

1972 年的慕尼黑事件 82

从《辛德勒名单》到《慕尼黑》 85

“屠犹”给“反恐”一个理由？ 88

难以逃脱的“人类状况” 90

下编：历史叙述与重构“真实”

一个国家的诞生：驱逐与复国 101

驱逐犹太人的历史 101

以色列建国 105

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49 年） 106

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 年） 107

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1967 年） 107

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1973-1974 年） 108

第五次中东战争（1982 年） 109

对话：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之比较 111

附录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结语·后记》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汉娜·阿伦特著 李茂增译） 139

结束语

新帝国的离心力

——美国“反恐”语境中的意识形态 187

西文参考文献 199

中文参考文献 201

后记 203

序：幽灵之镜

通过电影，主要是好莱坞电影来讨论犹太人问题的再现，王炎的新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面向。

在欧美文化的上下文里，“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20 世纪后半叶，犹太人的命运如同一则重要的寓言，一个尽人皆知却仍语焉不详的象征与警示，一处鲜血淋漓的创口或令人战栗的深渊。

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人”始终是欧洲史上的特定“选民”：一个内在的他者，一名自我的异类。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命名与释义，那是一次又一次的招魂和招魂仪式后的血祭。如果说，犹太人或犹太教是基督教历史的原点与“痼疾”，那么，确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言，他们同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替罪羊，一个遴选出的镜中恶魔——并非内在呼唤与渴求着的恶魔，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及其逻辑的毕肖映像。犹太人在欧美世界中的象征意义与位置，使之成了一个硕大且有效的寓言式能指，可以用来呈现

任何一个获命名又遭遮蔽、受放逐与迫害的异类、弱势与边缘；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他们”可以是工人阶级或废奴之后的北美黑人；于后现代社会中的批判者，他们可以是美洲或澳洲的原住民，是今日世界上的同性恋者；于我，“他们”可以是妇女解放运动百余年后的现代女性。

犹太人问题同时是一个历史与现实议题。欧美学界一度风行的“新”词：diaspora，译作“家国之外”或“流离民”，用以指称移居欧美的前第三世界国民或少数民族学者；其原本是用来书写犹太人身份的特有语词：流散全球，无家无国，经历着无休止的歧视、驱逐和迫害。正是纳粹法西斯主义以登峰造极的反犹主义和规模空前、效率空前的种族灭绝，将犹太人反身建构为一个空前真切的民族/种族。奥斯威辛由此而与广岛、南京一起，记忆着20世纪空前的人类暴行，质询甚至颠覆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信念。

“二战”之后，纳粹暴行不断遭到清算，反犹主义臭名昭彰；20世纪落幕处，德国总理在大屠杀蒙难者的墓前屈膝谢罪，大屠杀纪念碑高高低低地铺陈、绵延在柏林街头。然而，奥斯威辛所像喻的大屠杀却仍阴影幢幢、余音袅袅。对局外人和后来者来说，这场巨型屠杀浩劫始终隔绝着重雾障。这关乎人类暴行和人类直面同类之暴行的承受力——执著地追索日军南京大屠杀血证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36岁的风华岁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盛花时节猝然离枝的花朵，似乎便是最晚近的一例。关乎这暴行的承受者：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或曰“归来的游魂”绝少直接开口——因此拍摄达十一年、片长达九个半小时的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浩劫》（*Shoah*，导演：克劳德·朗兹曼，1985年）才令人撕肝裂胆。但即使面对《浩劫》，我们——后来的观者，也只是触及了那雾障所在，尽

管指尖已感灼伤，但那体验毕竟是如此浅表，甚至廉价。奥斯威辛，一如南京，即使暂且搁置其间的权力结构，它仍然指涉着历史的无力和重返历史的绝望，只留下无数无解的质询。即使有盟军拍下的成山的尸骨、焚尸炉中犹有余温的深深的人油、成库房的假肢、义齿、人皮灯罩或人脂肥皂，它所能告知的仍只是某些数据，尽管令人心碎齿寒，但那仍只是冰冷的数据（当然，在南京大屠杀的例证中，甚至这非人的数据也仍是“悬案”），而非此间加害/受害双方的“人类”逻辑与生命体验。此间，或许最为痛切的，是对“局外”人和外来者说来，知晓奥斯威辛（而非南京或广岛），似乎已成了当代人的“基本教养”或曰常识，但它却大都如风过耳，知之者甚少；关于犹太人问题，尤其是关于奥斯威辛的陈述，时如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所言，成了某种麻木不仁间的陈词滥调（《朗读者》）。甚或曾痛彻心肺的表达“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阿多诺），也成了某种信手拈来的套话。类似陈词滥调于是乎成了大众文化工业的恰当素材。20世纪70年代间，欧洲商业电影中一批影片成就了将纳粹分子性爱化的叙述模式。其间，纳粹党卫军的形象成了S/M（施虐/受虐）场景中的“最佳人选”（类似陈词滥调仍在为世纪之交中国的某些热映影片及某些女性书写所借重并分享）。似乎有必要再次提请米歇尔·福柯的论述，类似叙事“套路”无疑充当着阻断人民记忆的“历史呈现”（福柯《历史与人民的记忆》）。因为一如反犹主义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恶疾，对纳粹主义的追问与批判，必然延伸到对现代文明/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质询。

尽管经历“二战”，拒绝、回避反犹主义表达成了“文明人”的教养，但在整个世界上，“犹太人问题”远未终结。这不仅是指反犹主义仍如同

西方文明 / 现代文明内部的萦回不去的幽灵，纳粹主义仍如同漂浮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之上的梦魇，更重要的是，战后以色列国的建立，使得犹太人问题“逸出”了欧美，成了亚洲乃至世界性问题。“冷战”终结后，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不仅使得加沙地带事实上成为全球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而且成了今日世界上暴力逻辑至为赤裸、血腥的区域之一。当柏林墙倒塌，继欧洲的弥合之后是欧洲的重整与崛起之时，巴以之间，新的隔离墙在昭示新的隔绝与践踏。以色列 / 犹太人问题由是而成了“文明冲突论”试图涵盖而又无从充分阐释的命题之一。一如哈特、奈格里所言，今日世界上的任何区域性问题都必然地是某区域 + 美国问题（《帝国》），那么，今日的以色列则不仅充当着美国的西亚前哨站，而且事实上成为美国的能源霸权战的军事基地。但是，联系着犹太人、尤其是“二战”、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呈现并剖析这一今日世界至为酷烈的冲突，则成了全球批判知识分子又一处言说的瓶颈。

王炎这部新作，借重对若干部电影文本的分析，在华语世界的文化研究中首度开敞了这一重要议题。借助电影文本，作者尝试进入相关的话语与社会脉络，去触摸并把握此间不无反复的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历史、文化语境、社会心态与微妙的记忆和情感结构。这份书稿弥足珍贵。

戴锦华

2006年11月24日

引言：一个古老民族的影像寓言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问：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犹太人的生活将如何仍是可能的？我想这样的提法会更正确一些：在存在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代，与上帝在一起的生活如何仍是可能的？上帝与人的疏离感已变得太残酷，其隐藏也变得太深。尽管人们仍会“相信”令这些事情发生的上帝，可人们还能向他诉说吗？人们还能听到他的讲话吗？作为一个个体和作为一个民族，还能完全与他保持一种对话关系吗？人们还能向他呼喊吗？我们敢这样劝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毒气室的约伯“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善，他的仁慈永远长存”吗？

历史，作为宽恕的历史停止了，并且永远地停止了，它因为绝对的罪恶而应该止步不前。它永远停止了。人们感觉到了这同时是真诚又是矛盾、自我矛盾的双重信念。……我们感到没有改变、不可改变的信念，感到即使在不可赎罪的宽恕将在未来、未来一代那里实现的时候，宽恕也不可能发生，它始终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不合法的、丑闻的、暧昧的，与遗忘混淆在一起。历史将继续，与之同在的是和解，是与悼念活动相混同的暧昧的宽恕，是遗忘，是与罪恶的类似，这就好像是归根结底，我能够

在此概括这种未在一种程式中结束的发展进程。明天的宽恕，被允许的宽恕将应该不仅仅变成哀悼的活动，更严重的是，变成宽恕本身的哀悼活动——宽恕把宽恕变成它自己的哀悼。在历史的不间断性基础上、在毋宁说是无限的创伤的深渊中，历史在不断继续。

……还要为了这个“存在原罪”——在此，这个词不是为了犹太人专用的，除非就是犹太人，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再一次被解释为的人性的范例——请求宽恕、和解和救赎、偿还这些概念，连同要成为范例而产生的所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常常在此提出质疑。

——【法】德里达《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

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¹的最后，认为犹太教只是对基督教的粗暴的宗教批判，因而也就认定犹太教“只有”宗教意义。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难预见，犹太人的解放在他的笔下也一定会变成哲学兼神学的行为。

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观念的抽象的本质，即他的宗教，看做他的全部本质。所以他必然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犹太人轻视自己的狭隘教规”，抛弃自己的整个犹太教，“那就不会对人类有任何贡献”。

1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奥托曼帝国的衰落，许多欧洲犹太人主张集体出走巴勒斯坦来摆脱基督教社会，这时巴勒斯坦问题也正是欧洲公众的焦点。特别在德国，有关犹太问题的讨论更为激烈。许多学者把犹太人解放的出路归于放弃犹太身份从而就地归化。德国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曾于1843年发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论文，坚持认为犹太人只有放弃犹太教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这是因为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犹太人既无法解放自我，基督教徒和德意志国家也无力解放犹太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针锋相对，认为要观察现实的世俗犹太人，而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应剥掉掩盖犹太精神实质的宗教外壳，揭示人被金钱异化的本质。

这样说来，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就是：在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基督徒唯一的关系是一般人类的、结论性的关心……我们现在来试试驳倒这个问题的神学提法。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制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因素才能消灭犹太的问题。因为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犹太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观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观察平素的犹太人。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

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我们生活在一个马克思所说的金钱成为世俗上帝的时代，就连记忆也难逃出商品的逻辑，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有关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都会与生产和消费这两个貌似无关的商业环节结合在一起。这是个商品和消费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毛孔”的时代，当商品拉平了一切文化差异、削平一切民族个性时，当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将整个世界连接成无边无际的荒漠时，我们突然意识到思想已经被彻底挤压成一个平面，没有内涵，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突兀和空寂的当下。因为高速运转的电影工业正给我们生产着记忆，它的产品可以按照集成块的方式任意组合我们的过去，记忆的时间性被抽离了。我们有的只是影像化的、超现实的、不

可置疑的空间化的过去。人们不必再费神追忆似水年华，也不必再争论历史的真实与再现的可能，更不必思考自己的身份与家族和民族史的关联，超大的银幕“供应”给我们所需的一切，它告诉你你是谁，应该如何思考，该如何回忆。

当我们甩给服务生 60 元钱，在电脑屏幕上指点着中间的最佳座位，手里捧着半价的爆米花、一杯超大的可口可乐，坐在弧形银幕前，享受着“杜比”环绕立体音响时，我们真的以为回到了自己的过去，正遭受着纳粹铁蹄的蹂躏，经历着死亡集中营的恐怖，我们为犹太受害者的悲惨命运流泪，为美国大兵在千钧一发之际的出现而激动不已。走出影院后，我们也许不假思索地以自己的过去比附欧洲历史，顺手捡来好莱坞影片的浅显道理，词不达意地讲述着中国遭受的苦难。从 20 世纪初开始，我们就淡忘了表达自己经验的方式，习惯于“拿来”各种主义和理念，切身的体验却离我们愈来愈远。谁还会用自己的语言娓娓讲述 60 年前南京的屠城，自己的同胞如何像牲畜般被宰杀，自己的姊妹被何等兽性地蹂躏……在我们历史叙述中只剩下一成不变的统计数字和概念化的抽象事实。而 21 世纪的全球化商品大潮，更令我们失去了直接触摸世界的敏感；我们仅依赖金钱和产品间接地领悟自己的存在。强势的国际资本通过音像市场铸造着美国式的“英雄时代”和“全人类的英雄”，也同时塑造了自己理想的忠实消费者——地球村民。

本书从美国好莱坞对“二战”“屠犹”历史记忆的生产入手，对比欧洲的“大屠杀”影片，分析好莱坞在不同时期再现犹太大屠杀历史时，历史叙述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国际政治以及美国族群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也揭示出好莱坞在生产“屠犹”的视觉影像时，与利益集团在

政治上共谋，不断地拼贴、复制着历史记忆，通过文化消费来塑造世界电影观众的主体意识。最重要的是，以美国好莱坞文化为代表性价值的媒体，在全球同步上映的商业炒作中，不断生产着美国化的道德英雄，以及“不开化的”文化“他者”，试图在全球建立起普遍的价值和秩序。

对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犹太思想家们有非常深入的反思，也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与阐释。犹太神学家马丁·布伯在奥斯威辛之后讨论犹太教问题，对隐身的上帝充满了质疑和怨怼。他从犹太教中的神学问题入手，尖锐地提出：这个与上帝疏离的现代社会如何还可能与上帝共在？犹太人如何还可能希望上帝再次显现？尘世的生活如何可能救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犹太子民能与上帝直接对话的《旧约》时代的怀旧与向往，对充满嘈杂噪音的现代社会和毫无神的气象的消费生活的惆怅和绝望。作为一个有强烈宗教情怀的哲学家，布伯对启蒙之后的现代性思想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对越来越合理化的现代生活所蕴含的种种矛盾提出了深刻的质疑。纳粹的大屠杀，显然与技术的现代化和思想意识的工具化有着某种勾连；当现代理性思想抽干了哲学的精神和情感内涵，而将它转化为普遍化和形式化的知识的时候，人类就无法摆脱“无家可归”的精神困境。

法裔犹太思想家德里达则从伦理的角度，讨论宽恕、友谊和悼念等问题，他用解构的方式追问宽恕是否可能？宽恕纳粹屠夫与遗忘那段历史如何可能区分开来？悼念犹太受害者如何能不变成治疗幸存者心灵创伤的一副贴药？在无限创伤的深渊里，历史和时间如何可能不间断地继续？在这些困难和悖论性的问题面前，我们如何可能自信地认为，存在一个无矛盾的、前后一致的普遍人性和自由主体？